

回顾与探索

—— 语文教学改革

程力夫 著

回顾与探索

——语文教学改革的

程力夫 著

前 言

“中学语文教学非改不可!”这是近半年来大中学教师、中学生和家长以及社会人士的共同呼声。教材要改,教法要改,考试更要改。考试这个指挥棒,造成怎么考,便怎么教,怎么学。学科失去活力,教师失去创造力,中小学生语文水平下降了,关系着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志有识之士大声呼喊:语文教学要走出困境。

语文教学改革,是我数十年从事语文教育工作的追求。1946年开始走上讲台,初生犊牛不怕虎,撰文指责“国定本”充斥着“党国要人文章”和“诸子百家”。主张改用“活页文选”,私自用“开明课本”以代替,更进一步把进步作品进入课堂。1949年以前的三年教学虽有风险却是我教学生涯中黄金时代。五十年过去,老师生白发聚首,仍然难忘当年情文交融的课堂气氛。

1949年之后,有幸曾经受省教育领导的重视,给予进行教材、教法和考试的改革试验。福州三中、师大附中和永安一中等校都试编各自不同体系的实验教材,试验一轮,似乎都走不出——“文选”的框框,语文教材科学化怎能实现?不知何去何从?教材改革搁浅了。

1981~1983年,我省进行高中招生语文试卷的改革。试卷的特点是读一篇现代文章、写一篇作文、译一则文言文。被叫为“三大块”,主要考查阅读写作的能力,不搞支离破碎的繁琐的知识点,不考死背硬记的东西。试题的改革在《语文战线》发表后,

引起全国语文界的反应，基本是肯定的。试验三年之后，便随着考试指挥棒的飞舞，而有“疾”而终了。

教学方法的改革是我于1963年间同两位年青教师蹲点福州十八中，青年教师执教，我做参谋。经过他们的努力，总结出四条有规律性的经验：①以读为基础，从懂得读、读得懂到读到手；从读学写，从模仿到创造；②以练为主，学习语文要有一个反复实践、逐步深化、融会贯通的过程；③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使学生掌握学习语文的方法，养成良好的习惯；④课外读写指导，是提高学生语文水平不可缺少的一环。经验总结在《人民教育》发表后，得到很多老师的鼓励。经验没有深化下去，因为紧接着批判《海瑞罢官》的大气候，没有“政治第一”的四条规律从此销声匿迹了。

1987年，全国高考的标准化试题从前两年占总分（120分）的30%而占55%。对此，陕西师范大学编辑出版的《中学语文教学参考》9月号以《说长道短评国卷》为题，综述京、鲁、豫、皖、黑、闽、川、陕语文高考反馈信息，报道了十几位教师的意见，大多持肯定态度，只有我独抒己见，所以，编者作如下介绍“但是，福建中语会会长、省民进副主委、教育家程力夫先生对‘标准化’试题却有不同看法：今年高考语文试题大部分为标准化试题，这也许是‘潮流’。但，我总觉得有的过于繁琐破碎。看得出，道道试题都是命题者呕尽心血编排的。搞几个似是似非的ABCD，令考生咬文嚼字，选择识辨。如此这般，是否就算‘能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我有点不理解。考试可以说是考查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几年来，试题的逐步标准化，教与学也在标准化，不久的一天，标准化的教，标准化的学与标准化的考统一起来，学生的水平能达到‘具有现代语文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说话能力，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吗？这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也

许是我‘杞人忧天’姑妄言之。”我的忧思，在当时有些孤寂的感受。

1949年之后的种种试验，都是在富有改革精神又有胆识的省教育领导同志抓住机遇而充分信任教师而进行的。数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怀念他们，更怀念已经逝世的王于耕和陈以一两位老同志。

《回顾与探索》的书名系用1984年应人教社刘国正同志主编的《我和语文教学》约稿而作的篇名。那是回顾1946~1989年的语文教育工作和提出要探索的便是试题的改革。现在再用这个篇名为集子的书名，回顾与探索的还是试题的问题。但我老矣，无能为力了，然而，相信自己能够看到改革的实现。

程力夫 1998年5月1日
于《中学生语文报》编辑部

目 录

一、前言	(1)
二、回顾与探索	(1)
三、福州十八中初一语文教学改革初步经验	(13)
四、对高考作文试题的意见	(23)
五、我们对语文考试命题的改革	(27)
六、语文试题散论	(34)
七、漫议高考试题的“巧合”	(43)
八、课外阅读指导不可忽视	(46)
九、浅谈语文第二课堂	(49)
十、语文教材编法新设想	(52)
十一、愿为教改迈新步	(59)
十二、高考语文试题要改革	(63)
十三、从语文试题改起	(67)
十四、我教国文的经验	(70)

十五、论中学国文	(73)
十六、对中学国文课程的我见	(77)
十七、论中学作文	(81)
十八、开拓者的脚印 (任凤生)	(85)
十九、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陈思巡)	(91)
二十、榕树，又绽新绿，又绽新绿 (李思德)	(93)

回 顾 与 探 索

我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和语文教学研究工作将近四十年了，说起惭愧，既谈不上有什么贡献，也理不出略有头绪的经验，只留下一些颇有感受的往事和探索不清的问题。

一九四六年秋，我在福州一所比较著名的私立中学教国文，这是正业；兼当报社编辑，写写文章，作为副业。教的课本有两套：明的是当时的“国定本”；暗的采用《开明国文读本》和自选读物。正副职业和明暗教材所引起的一些事，时至今日，记忆犹新。

当时教国文，只教学生能读能写。学生不重视国文，却是普遍现象。我所在的这所教会办的学校学生特别重视学英语，他们毕业后多数要升外国办的协和大学，就业也是到“金饭碗”的海关、邮政部门去，所以对国文不感兴趣。当时，我年轻好胜，不甘心当个不被重视的学科的教员。如何使学生爱读国文，成为我着力思考的问题。

经过一段教学实践，我发现学生不重视国文学习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很厌恶那些“伟人”文章和深奥的古文，二是那“冬烘先生”式的依注讲解的教法，使他们昏昏欲睡。于是，我瞒着学校发动学生去买《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本作第二教材。同时改变课堂教学方法，采用学生习读，教师讲、问，学生答、练。这

样，教材与教法都使学生感到新鲜，收到一些成效。但给我记忆最深的是另一些事。

一九四七年，我和青年木刻家、地下党员林樾合作《浮生相》。我写诗，他刻画，大家“想用一枝笔，一把刀，来打击这可诅咒的时代”（《浮生相》后记）。一天一组的诗与木刻在一家进步报纸上连载。学生知道诗是老师写的，也许出自偏爱而感到兴趣，他们剪贴、抄录。我想自己初学写讽刺诗，很幼稚，学生应该读优秀的作品。于是，我把《马凡陀山歌》引进了课堂，朗读，讲解，议论，激起学生强烈的兴趣。因为作品所讽刺的正是学生所不满的，山歌唤开了青年的心扉。这以后，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等作品都成了学生最爱读的“课文”了。“国文”的课堂天地变了样。师生在阅读上有了共同的兴趣，学生爱读，就会思索问题，便会提出问题，课堂上的教与学似乎是在交流心得，互通情感，气氛亲切和谐。那样美好的情景，时过二三十年，一些老同学相遇时还津津乐道。学生由于爱读也爱写了，受老师时常发表文章的影响，他们不仅有了写作的激情，而且也有发表的欲望，为了让学生写自己所要写的事物，说自己所要说的话，作文课多由他们自己拟题写文章。他们写得真实，有感情，对当时社会的黑暗，也敢讽刺抨击，学生们在觉醒。我指导他们编辑的壁报，成为这所学校唯一的学生刊物，引起很大的反响。1948年秋，他们编辑出版《天亮》油印本，响往着明天的解放。这本刊物是在我被迫离校后，他们自编的，请我当顾问，并为它写了一篇文章。第二期还没有出版，福州“天亮”了，他们欢欣鼓舞。

这一段的实践教学给我很多感受，最深的体会便是觉得作为国文教师本身要能读能写，这对于教学生学读学写的作用是很大的。我自己的读写能力，也是在和学生共同切磋中提高的。教学

相长永远是真理。1946 到 1947 两年间，我先后在报纸上发表了《论中学国文》、《再论中学国文》、《我教国文的经验》、《对于中学课程的我见》和《论中学作文》等五篇文章，主要对“国定本”发表议论，指出它的两大流弊：一是古典作品选的过多过深，二是“党国要人的伟论”充斥课本，这些都“不合学生的口味与程度”，更“不符合时代的需求”，提议用活叶文选来取而代之。我所写的文章引用了不少吴伯威、郭绍虞诸先生的论述，我是深受这些老一辈语文学家启发的。叶圣陶先生的《国文教学》是我经常翻阅的书，它指导着我改进国文教学。

解放前的这段教学生涯，也许是我一生热爱语文教学而不改行的主要原因吧！

二

一九四九年秋，福州解放。我在中学教了五年的语文，后调到福建省教师进修学院（省教育学院的前身），担任教学和教学研究工作直到今日（“文革”除外），也许可以拖到我不能工作的那一天。二十多年来，我热爱教研工作，并没有因被人讥为“杂家”而见异思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文革”前，厅、院两级领导同志的信任、支持、放手让我们工作。那来自上面的“路线”，他们无能为力，我们也能谅解。同志们常说我的机遇好，也许确是这样。如果遇上那些不懂硬要装懂的领导，教研工作就会寸步难行。我真正体会到“领导是关键”这一关键的作用。二是本省广大中学语文教师的合作和支持。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文革”中，没有一个语文教师给我送一张“大字报”，来加深我的灾难。相反，他们倒因我的牵累而遭灾，蒙受不白之冤，但他们还在关心着我的命运和下落。粉碎“四人帮”后，几十封充满

着热情和鼓励的信，令人热泪盈眶。这不是私人情谊，因为其中有不少素不相识的老师，他们是出自对语文教育事业的感情。我写这些，绝不是自我吹嘘，只想说说在长期工作中获得的真实感受，教学研究工作和老师们的关系，犹如鱼和水一样不可分离。惭愧的是自己对语文教育工作没有做出贡献，辜负了大家的期望。所以，我只能写一些还要继续研究的往事。

我开始做教研工作时，虽然有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引，也学习了凯洛夫的教育学，但落实到语文学科，又觉得没有一套语文教学理论的指导，心里很空虚。我又找出解放前留下的叶绍钧、朱自清合著的《国文教学》和夏丏尊、叶圣陶合著的《文心》来学习。时代虽然不同了，可是老一辈语文教育家的理论仍然有指导意义。于是，我开始宣传叶老的语文理论。当时，他是教育部副部长，传播他的教学观点，总不至犯错误。同时，我搜集解放前老一辈语文学家的文章，一九六二年一月我院编辑的《教学通讯·语文版》（半月刊，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上开辟了“语文教学史料选刊”专栏，连续选登了蔡元培、叶圣陶、朱自清、黎锦熙以及梁启超诸位的文章数十篇，给语文教师提供了研究资料，受到欢迎。正在我们比较重视研究老一辈语文学家语文教育理论的时候，一九六三年十月间，叶老同韦悫同志两位教育部副部长来闽视察。十月廿七日上午，叶老在语文教师座谈会讲了话，下午向福州市全体中学语文教师作了长篇的报告。我们把报告记录铅印成本，全省中学语文教师人手一册，组织学习。叶老报告的精髓是强调“教，为了不需要教”的教育思想，这篇讲话给全省语文教师以极大的教育启发，我也找到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的金钥匙，一直成为语文教研工作的主导思想。叶老报告之后，我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观念，认为对叶老的语文教育思想应该做系统的研究，也包括老一辈语文专家的论著，从而整理我国语文教学

的基本理论。这促使我计划编辑一套《语文教学史料丛刊》，第一辑《叶圣陶论语文教学》，于一九六三年底出版。有的同志说，这是解放后编选叶老语文论文集的第一本，真否如此，我不了解，供不应求，却是事实。可是，到了一九六五年，第二辑《朱自清论语文教学》就不能付印了，我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闷棍。想不到“革文化之命”的运动开始不久，编辑出版《叶圣陶论语文教学》竟成为我“反革命”罪状之一，横加批判。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推倒这个荒谬的结论而平了反。由于我宣传叶老的语文教育思想和“文革”遭遇，所以，一九八二年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出版时，我捧着新书两卷，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文革”前，我要编史料丛刊的未了心愿在“文革”后开始得到部分的“补偿”，一九七九年我着手编选从清末至解放前的语文论著，第一二两辑《语文教学研究资料》也于一九八〇年初出版了。

“文革”之前，我在教学研究的实践过程中，深深地认识到对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经验须做科学研究的必要，我只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深憾没有自己的研究成果。“文革”之后，思想解放了，语文界有志有识的同志们开始“引进”国外语文教学的资料，分析，研究，参考。这又打开了我的眼界，在几位同志的鼓励和帮助下，我不自量力地主编《语文教学借鉴丛书》，张志公先生在特为丛书写序中说：“《语文教学借鉴丛书》这个名字定得很好。鉴就是镜子，拿来照一照，看看我们语文教学的作法哪些是好的，哪些地方还不足，参考别人的一些经验，促进我们语文教学的改革。我们相信，这套丛书是能够起到这个作用的。”丛书第一本《日本中学语文教学》（鲁宝元译）很受读者的欢迎，帮助了教学，可见起了借鉴的作用。由此使我认识到，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借鉴外国，敢于改革，都是搞好语文教学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几个方面。

三

说起改革，我不敢说自己是“敢”字当头，只能说我的教学思想不大保守，对于改革很有兴趣。有些同志说我喜欢标新立异，我不认为这是讽刺，倒是说出我搞教研工作的个性。记几件改革的往事，也许还有一些意义。

一九六三年人教社编辑出版的《语文》，可说是建国以来较受教师欢迎的一套课本。我也曾经一度被借调参加编辑工作，对于大纲和教材的编辑意图了解得多一些，想使用这套教材，从从一开始在教学方法上做改革试验，探讨教学的规律。我同两位青年教师在福州十八中学（教育学院实验学校）两个班进行教改试验。我们拟定“读为基础，从读学写，以练为主，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作为试验的中心课题。两位青年教师各教一个班，我同他们一起备课、听课、看作业和出主意。青年教师的习惯因袭不重，敢于创新，勇于尝试，肯下功夫，仅仅经过一个学期的实践，取得了一些成绩，形成了几点认识：“一、以读为基础，从懂得读、读得懂到读到手；从读学写，从模仿到创造。”其中最重要的是“把长期以来包办代替的教学法改为指导学生自己读书”，那时我们认为“这是教学的革命”。“二、以练为主，学习语文要有一个反复实践、逐步深化、融会贯通的过程”。这里最重要的是解决“课外练得多，课内练得少”造成学生“负担重而受益少”的问题。提出“课堂是练的主要场地”，试验有很大成效。教师讲精了，学生练多了，负担减轻了，能力提高了。“三、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使学生掌握学习语文的方法，养成良好的习惯”；“四、课外读写指导，是提高学生语文水平不可缺少的一环”。其中还包括复习和考试方法的改革。这个经验曾在全省教学会议上交流，得

到教师的赞赏，并由我写了《福州十八中初一语文教学改革初步经验》，发表在《人民教育》1964年4月号上。这些经验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可是从当时的一般教学实际来看，还是探讨了一些规律性的问题。出人意外，我却挨了没有政治挂帅的责难。从此，初步经验和改革试验也就偃旗息鼓了。敝帚自珍，我虽恋恋不舍，但“左”的压力，也无可奈何。“文革”中这又成为批判的靶子。忆往事，想今天，不彻底肃清“左”的流毒，改革之风是不可能大兴的。

至于十年内乱期间，原是无话可说的，而我个人却有一个“教改”的“小插曲”。我流放山区整整八年。前四年在生产队“劳动改造”，后四年，被定为“在政治上犯严重错误，行政降三级处分”后，也叫做“落实政策”，安排到山区一所新办的中学教书。教员大部分是文教系统的下放干部，有共同语言，“气味”相投。校长是一个县公安分局的局长下放来的，他不懂教育，不知为了何故，对于我似乎很尊重，从不过问我的教学。校处山区，“天高皇帝远”，干扰极少。农村学生比较朴实，师道还有一些尊严。这样的环境在当时很难得。我对“文革教材”只选教毛泽东、鲁迅和文言文等三类课文，确感无聊，又以山区寂寞，心情抑郁，难以排遣，偶然想在教学上搞点什么尝试，这一闪的火花竟使在浩劫中被扑灭的死灰有点复燃。我想着“文革”前所遇的一个问题，语文教材是一篇篇课文组成的，语文知识是通过讲解课文而传授的，零碎，杂散，重复，学生没有学到稍有系统的基本知识，也就不能具有运用知识理解文章的能力。孤立地学了一篇又一篇，这不是好办法。我尝试一种做法，把要教的课文按文体组成若干单元，例如小说单元，我以讲授小说的基本知识为主，以一两篇作品为例（学生预习过的）进行分析讲解，力求讲清知识概念，又讲知识的运用，然后指导学生练习分析作品。农村学生的智力并

不比城市学生差，认真学习的学生进步很快。小尝试鼓起我的信心，便在两年制高中完整地试验一轮。教材分议论文、毛主席诗词、鲁迅杂文、短篇小说、现代散文、古代散文、古典诗词等七个单元，反复两次，加深提高。每周一课时讲语法和修辞知识。两学年试验结果，学生读写能力有显著提高。从此，我在语文教材的编排体系上有个想法，能否改变文选的编排老路，建立以读写知识为体系来组织教材，即知识——范例——练习。这个设想到了一九八〇年初才写成比较具体的方案，带去参加了一九八〇年在北京香山召开的全国语文教材改革第二次座谈会，没有机会交流。我曾同省教育厅一位副厅长谈到这个设想方案，他很赞成，只因编辑人员很难组成，没有实现。到了一九八一年底，人教社编辑出版《中学语文教材和教学》一书，其中附录夏丏尊、叶圣陶合编《国文百八课》的《编辑大意》和《文话一》，衷心敬佩老一辈语文学家早在一九三四年就想通过该书的编辑，“给与国文以科学性”。该书每一单元，“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文话以一般文章理法为题材”；“次选列古今文章两篇为范例”；“再次列文法或修辞，就文选中取例”；“最后附列习问”。这个编辑体系是很科学的。可惜，我没有读到原书，但是，多么希望教材编辑机构也能编出这样体系的一套语文课本，使语文教材多样化，供教师选择使用。

语文教材改革，势在必行。这是一九七八年教育部委托人教社召开九省市语文教材改革第一次座谈会的一致认识。我参加会议返省后，省教育厅领导十分重视，很快成立专门机构领导语文教改工作，在人力物力上都提供充分有利的条件。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同志们一道积极进行调查研究和建立试验基地。一九八四年秋十分顺利地福州三中和永安一中两所学校搞了两个不同体系的自编教材，坚持三年试验，于去年完成了任务，取得显著的

成绩。福州三中以听说读写综合编排教材，听和说两项都编写课文和练习。这是这套试验教材的特色。永安一中以文学为体系，按民间故事、童话、寓言等各种文学形式组成单元编选教材，各年级个别循环，加深加广。每篇课文，前有阅读提示，后有练习思考。它的特点在于着重自学能力的培养。这两所学校自编的试验教材虽很粗糙，总算为教材改革增添了两个可以研究的品种。可惜的是另一种改革教材编印了第一册而未能付诸试验，我至今仍感遗憾。原定一所省重点中学确定一个比较大胆的改革方案，所谓大胆就是初中阶段不读文言文，集中力量使学生们现代文读写能力达到较高的水平。这个方案拟定以前，我们搞文言文问题的调查，曾到大学、中学、机关、部队和工厂等十几个单位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所得的意见分歧很大。多数人主张要读文言文，还要多读一些，最重要的理由之一便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问题，再次便是认为鲁迅、郭沫若等等语言大师都是精通文言文的，所以，他们的白话文也就通了。少数同志主张初中可以不读文言文，要把现代文的读写能力提高到较高的水平，使一部分初中毕业生适应进入中专学习或就业需要，另一部分学生升上普通高中，具有较高的现代文读写能力，再学习文言文，估计不会有很大困难。我倾向少数人意见。目前中学生的语文现状就是现代文读写能力很低，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要求也没有达到。在教学中，重文言轻现代文是普遍现象。用一句不恰当的说法，叫做“两败俱伤”。原因自然很复杂，但能否通过教材的大胆改革，搞一次“冒险性”的试验，或有助于改变这个现状。一九七八年，一所重点中学几位老师也有志改革，并得到领导的同意，方案定了，第一册也编印出版了，最后不能进行试验教学。什么原因，就不必说了。这个试验的流产，很多同志为我庆幸，因为他们看出中学文言文的数量不但不会减少，反有增多趋势。高考语文试题中的文言文试题

为四十分，占语文总分的三分之一。一九八三年度高考语文命题组发表的文章中对文言文的要求已经强调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可见文言文教材的改革是不可能大胆的。我不是反对中学生读文言文，而是搞不清学习文言文的目的和要求。脑海经常翻腾着三个疑问：中学阶段读一百多篇文言作品，就能起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作用吗？真的有助于提高读写现代文的程度吗？确是大学各专业的需求吗？这些只是存疑，有待更多同志共同探索。

地方搞教材改革的试验，只能限在初中阶段。高中受着高考试题的制约，谁也没有胆量去碰这根“指挥棒”。对于升学统考语文试题的问题我是有一些看法的，曾经发表两三篇评议高考试题的文章。所以在两所中学进行教材改革试验的同时，就考虑着中考语文试题改革问题。这里必须说及我省教育厅领导有改革之志和对我的信任，同意我的命题意见，让我主持语文命题组，并让我连续三年试验。我们认为升学统考试题应该体现教学大纲的要求，大纲对初中毕业生最重要的要求便是必须具有阅读和写作一般现代文的能力。试题应该着重考查阅读一篇现代文和写一篇现代文的能力，不宜考查死背硬记的东西，也不宜零散碎杂。我们的试题只有“三大块”：第一块是“现代文阅读”，综合考查拼音、词语解释、思想内容、写作方法和语言运用等方面。一九八一年选用玛拉沁夫的《旅行家树》；一九八二年选用吴强的《新核舟记》；一九八三年选用刘白羽的《急流》（节选，写闽江的）。学生学习《白杨礼赞》、《松树的风格》和《核舟记》等等课文，该会“举一反三”，具有独立阅读上述选文的能力。这样命题的意图在于“指挥”教师在教学上必须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独立阅读整篇文章的能力，不能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搞填空、改错等单项练习上。第二大块是“文言文阅读”，大纲对初中毕业生没有提独立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力的要求，所以我们不选课外文言文，采用文